

文化批评的观念

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美〕 理查德·沃林 著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 of Cultural Criticism 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

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

现代性研究译丛

文化批评的观念

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美〕理查德·沃林 著

张国清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批评的观念/(美)沃林著;张国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现代性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 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

ISBN 7-100-03035-8

I. 文… II. ①沃…②张… III. ①文化—批评—研究—西方国家—现代②政治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G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768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文化批评的观念

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美] 理查德·沃林 著

张国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035-8/B · 460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1/2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9.00 元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不穷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

2 总序

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

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

4 总序

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献给我亲爱的朋友
尤利西斯·桑塔马里亚
1952 年生于纽约市
1991 年卒于意大利佛罗伦萨

兄弟啊，
你的死给我留下了悲伤和孤单；
你带走了我们的所有欢乐，
那是你在世时你我甜美情谊的结晶；
我所有的快乐，
皆因你的死而破碎了。
我怎能不千万遍地念叨着你，
怎不想再一次聆听你的声音，
怎不想再一次亲睹你的容颜，
因为你赐予我的至爱，
甚于我对生命的眷恋？
至少我会爱你，直到永远，永远。

——卡特洛斯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英文版序言	(13)
关于曼·雷《想像的萨德肖像》的说明	(28)
导 论 色拉叙马霍斯的幽灵	(31)

第一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

第 1 章 批判理论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	(61)
第 2 章 法兰克福学派： 从跨学科唯物主义到历史哲学	(89)
第 3 章 仿真、乌托邦与和解： 对阿多诺《审美理论》的救赎性批判	(110)

第二部分 政治存在主义

第 4 章 卡尔·施密特、政治存在主义和总体国家	(135)
第 5 章 梅洛-庞蒂和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64)
第 6 章 萨特、海德格尔和历史的明晰性	(190)

第三部分 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第 7 章	新实用主义的重新语境化： 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政治意义	(221)
第 8 章	米歇尔·福柯和理性的他者之探索	(250)
第 9 章	雅克造的房子：解构主义和强评估	(282)
注 释		(313)
索 引		(353)
译后记		(359)

中文版序言

理查德·沃林

对作者来说,再也没有比得知自己的著作已被人译介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通过这种方式,作者的文本获得了新生:其言论和思想获得了新的切入点和新的意义。不过,令我尤感荣幸的是得知拙作《文化批评的观念》将以中文出版。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人民在近些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成就。为此,我尤其要感谢浙江大学政治学系张国清教授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作为张教授和作者合作的结晶,本书凝结着我们两种文化的学者的友谊和希望。

张教授邀请我借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就中文读者感兴趣的某些问题谈点看法。

那么,就让我从本书书名开始吧。确实,“terms”一词有点含糊性。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它指“words”(“言语”、“言论”);而在狭义上,它暗示某个给定习语(idiom)或话语(discourse)的疆界和局限。七年以前,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过太多考虑。相反地,我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三个思潮上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对西方(欧洲和北美)批评思想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如果说有一个潜在的主题贯穿于我所讨论的三个思潮(即法

2 文化批评的观念

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反黑格尔的主题。请让我对此作些解释。黑格尔哲学——作为世俗神正论的一个形式——明目张胆地把“现实性”和“合理性”等同了起来。凭借“充足理由律”(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黑格尔声称,现存的任何事物都肯定有一个合理的基础或根据。他甚至把这个公理进一步应用到了历史领域。他在《历史哲学》中宣扬“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审判”。总而言之,他的“客观精神”哲学(《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欧洲复兴的事后证明。因此这种哲学不利于实质性的政治变革。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左翼黑格尔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斯·施蒂纳、阿诺尔德·卢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抨击了黑格尔哲学,认为它毫无保留地神圣化了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相反地,我将在本书中给予探讨的 20 世纪文化批评的诸多见解坚信:“合理性”和“现实性”被一条无限的鸿沟隔离了开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和混乱的深刻影响下,它们断定,在某种深刻地非黑格尔的精神中(并且首先在欧洲启蒙运动的演进中),某些非理性力量——野蛮的帝国主义、战争大屠杀、大毁灭、国内的社会压迫、核毁灭,等等——取得了胜利。因此,在马克思和康德用“批判”来指示某套给定话语或思想样式的固有概念局限性的意义上,他们的精神是“批判的”。文化批评家的角色则在于精确地揭示“现实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差异,暴露事物的实然存在和应然存在之间两相对立的隔阂。

因此,除了关注历史现实的诸多失败之外,文化批评还包含某个潜在的乌托邦维度或解放维度。它相信,通过义无反顾地关注现代的诸多缺憾,它将获得导向某个更融洽、更和谐的未来的前提

条件。

※

※

※

也许,了解隐藏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中的批评意图的最好办法是把它理解成同后现代主义的一次对质(confrontation)。后现代主义是在本书第三部分中得到尤为明确地探讨的一个话题。在那里,罗蒂、福柯和德里达的工作受到了批评和讨论。在欧洲和北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后现代主义一直是文化批评的主导形式。它具有的各种思想弱点和失误——它不适用于某个新的后极权主义时代(那个时代可以从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之日算起)的立场和问题——是本书所要通篇探讨的核心问题。尽管其文化批评的许多重要论断仍然是富于成果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和腔调往往难以同21世纪民主文化的建设性政治需要协调起来。公开地卖弄“启示录式的腔调”(德里达)、妖魔化现代性、经常地抹去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政治差异(海德格尔),诸如此类的话语表明了它自身同市民意识是格格不入的。就21世纪所面临的各种令人窘迫的政治难题而言,后现代主义具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偏见和自我消解地夸张的极端主义倾向。从其以往的所有言行来看,它对具有市民政治文化需要的公民显然没有多少帮助。

在向中文读者阐明了我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立场之后,我接下来想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谈点看法。

I

在19世纪末,“悲观厌世的情绪”已经成为一个主导话题。颓废主义作为一个艺术运动泛滥了起来。在尼采的主持下,在祛魅的欧洲思想界里,虚无主义变成了一种标准哲学。世人一致地唉

4 文化批评的观念

叹,崇高的欧洲理想——进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永久和平——都已经失败了。按照尼采对这个问题的著名界定,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消解了自身的价值。目标失落了;而‘为什么失落’的答案却没有找到。”到处都笼罩着一种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或迷茫困惑的气氛。

于是乎,有人对这种祛魅状态作出了存在论的回应。在广泛的欧洲思想界里,一系列新式的明确地反对启蒙价值理想的通常同“生机论”有所瓜葛的观念发展了起来。如在柏格森(Bergson)和索列尔(Sorel)的学说中那样,原始的和非中介的东西成了启蒙理性概念的对立面。追随于尼采之后,在帕雷多(Pareto)和莫斯卡(Mosca)之流的意大利社会理论家中间,科层和等级价值在同资产阶级的人人生而平等理论的论战中被恢复了名誉。这股思想逆流以多种方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重大政治事变的重要先兆。那些事变预示着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兴起。那种意识形态受到了某种相似的反理性逆流的触动。如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1933年初就断定的那样,“1789年因此将从历史上被清除出去”。

II

随着20世纪的行将结束,西方人又将面对一种新的文化悲观主义。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叶(Charles Maier)谈到,一场总体化的流布甚广的“道德危机”正在影响着西方的民主:人们对政治家和政治秩序处理当代僵局的能力丧失了根本的信心。德国人称之为政治的厌烦(Politikverdrossenheit)。梅叶努力把这种现象同后冷战时代受到挫伤的历史期望联系起

来。他说道：“道德危机……是以对历史后果和迷茫状况的感悟为标志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已经被一个卑劣的或例行公事的时代——诗人奥顿(W. H. Auden)所谓的‘拙劣地虚伪的岁月’——所取代。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令人心灰意冷的信念：伟大的事业要么已经被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要么已经被出卖了；无论怎样，它们都已经完结了。公众活动的任务似乎只是在某个伟大的所向披靡的凯旋后作一些必要的收拾残局的工作而已。”

然而，在过去 80 年里发生的全球性灾难——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环境破坏、核威胁——大大地超出了 19 世纪人们所忧虑和担心的程度。而此时此刻，人们或许把尼采曾经嘲讽过的西方文化理想描绘成正处于“后衰微”(post-exhaustion)状态中的东西。诚然，对于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前缀词“后”(post-)的修饰重要性——后现代主义、后历史、后结构主义、后批评、后殖民，等等——不仅具有描述的意义，而且包含着大量充满希望的想法。它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愿望：我们将超越现代的种种挫折，急切地渴望跨入类似于晚期海德格尔称作神秘的“另一个开端”的一个阶段。这些充满希望的想法也有助于解释当代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之所以热衷于“他性”和“差异”之类范畴的原因。要是与当前的现状相比真有一个“不同的”或“其他的”地方是更加令人向往的，那么此类问题就不会(或至少不太会)被提出了。

III

当然，还存在着这样一层意思，后现代性概念旨在以一种无可争议的方式反映我们当前的历史处境。作为艾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在前不久称作“极端的时代”的后继者,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丢掉了幻想的时代。因此,后现代主义仅仅表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不再天真地或无批判地看待现代性。我们认识到,现代性既包含着许诺又隐藏着杀机。在用于人类改良的潜力中蕴含着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我们再也不会单纯地相信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孔多塞的“人类的无限完满性”和康德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之类让人上当受骗的启蒙专用语了。不存在引导人类弃恶从善的自动进步。相反,一厢情愿地把人类历史过程置于自动控制之下的愿望将会导致后患无穷的灾难。因此,后现代性精神以新卑微性的多种方式向世人发出了忠告。作为男人和女人,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可错性。

在保持难免错误论和折衷主义的这种新心境的过程中,人们还在不同世界观中间发现了某种新颖而精致的反意识形态见解。一种开明、宽容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滋长了起来。就这一方面而言,今天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1989年革命是一个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事件。作为公开宣布非意识形态的、“自我限制的”革命,它们自觉地竭力反对以往历史革命的意识形态狂热。它们明确地要求祛除两次典范的“现代”革命——法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过火的救赎热情。为此,就这些革命把实用主义、开明和宽容看作是“后现代的”主要境界而言,人们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因此,中欧异端分子的著作——例如,像维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无权者的权力》(1979年)——产生了远远超出地区性的影响。并且,它们变成了关于某种新人类情感的寓言。那种情感经历了现代化精神之狂热的和浮士德式的无数次磨难。那种精神无视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需要付出的巨大人类代价。

IV

与此相反,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在西方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它大体上是一种来自法国的后现代主义,不具有我刚才描述过的东欧变体的那种谦卑性。尽管它公开承认是后形而上学的,但是它几乎从不反对去阐发一些流布甚广的、准形而上学的主张,诸如“人”、“作者”、“历史”、“意义”等等已经死亡的主张。它对遍布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幽灵(德里达)和影像(鲍德里亚)的热衷从一开始就有意要成为某个批判性揭示过程的组成部分。不过,它对于具体历史出路前景的绝望很快引起了世人的认同和共鸣。这种否定的历史哲学同马克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的历史哲学相差无几。在这种哲学的影响下,它只能提出一些华而不实的、超历史的出路:分延(differance)、主权、原欲经济学、绝对嬗变、根茎思维,或者“一种不同的关于身体和快乐的经济”(福柯)。因此,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欢迎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并且以这种方式格格不入于现代世界”。他们借此确立了一种强硬的反现代主义姿态来对抗现代主义的态度。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他们把自发的想象力、自我经验和感触全都置换成一些隐秘而原始的东西;并且以一种摩尼教的仪式,他们使工具理性对立于是只有借助于‘召唤’才能得到证明的某个信条:权力意志或主权、大写的存在或狄奥尼索斯的诗意的力量。”对于熟悉上个世纪反理性的人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老调重弹而已。